

魏晉文化与文学論考

任继愈題

刘志伟 著



魏晋文化

与
东
晋
文
化

刘勰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魏晋文化与文学论考/刘志伟著. —兰州: 甘肃人民出版社, 2002

ISBN 7-226-02450-0

I. 魏… II. 刘… III. 古典文学-文学研究-中国-魏晋南北朝时代 IV. I206.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2) 第 028031 号

封面题签: 任继愈

责任编辑: 连凌云

封面设计: 宋武征

魏晋文化与文学论考

刘志伟 著

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730000 兰州市滨河东路 296 号)

天水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 × 1168 毫米 1/32 印张 14 插页 2 字数 336 千

2002 年 5 月第 1 版 2002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000

ISBN 7-226-02450-0/I·599 定价: 28.00 元

英雄时代的社会风气与文学

——《魏晋文化与文学论考》序

赵逵夫

王国维在《宋元戏曲史》之《自序》中说：“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举“楚之骚、汉之赋、六代之骈语、唐之诗、宋之词、元之曲”，谓“皆所谓‘一代之文学’，而后世莫能继焉者也”。清代学者焦循也说过类似的话，但不及王氏的概括确当。所以学者们在评论到汉赋或唐诗等的时候，常引到王氏这几句话。但是，如果进而思考为什么“一代有一代之文学”，则会发现，除了语言和文学自身发展的一般规律之外，还有当时意识形态、文化思潮、社会风气等方面因素的影响。当然，政治、经济、战争、内外文化交流等对文学创作的影响很大，但是，抛开作品的内容、题材不说，就作品的形式、语言风格、精神风貌方面说，这些因素大部分情况下不是直接影响及作品，而是通过随之而起的文化思潮和社会风气影响到作品。

春秋战国时代礼崩乐坏，百家争鸣，意识形态领域思想活跃，儒、墨、道、法、兵、名、农、医、阴阳等，各逞其说，俱放异彩，《老子》的深刻玄远，《论语》的简洁隽永，《庄子》的汪洋恣肆，《孟子》的议论风发，《荀子》的朴茂渊懿，《韩非子》的峻峭通脱，皆后世罕有其匹。这一阶段中集结成的《诗经》奠定了后代文学现实主义的基础；屈原为代表的楚辞作家，以浪漫主义的手法，留下了不朽的杰作。纵横家奔走于

各国之间，以三寸之舌谋卿相之位，虽然没有留下重要的文化、思想的遗产，但他们冲破宗法制度，积极参与政治、参与国家事务的精神，对后来的士人以很大的影响。但后来四百来年的情况就大不相同。秦代采取思想钳制的办法，造成文化荒漠；汉初鉴于秦朝的苛暴，崇尚无为而治，除贾谊等个别人之外，学者多不见有什么深刻的思想。至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思想领域几成一潭死水。东汉除承袭西汉的重儒宗经，以证明是继前汉正统之外，特重谶纬，使意识形态又多了一层迷信的色彩，儒学转化为神学经学。一直到汉末，汉王朝的统治力量大大减弱，军阀们希望趁乱以取天下，儒学失去了统治地位，思想领域又一次出现了“礼崩乐坏”的局面。士人们择主而仕，有纵横家之风，治诸子之学者，也各自寻求理天下、致太平之良方。只是这一次不是先秦时代各种思想的复活，而是凭借前代的思想资源，形成一些具有融合各家性质的新思想。如曹操，他不仅推崇刑名，且崇尚墨家的俭德；桓范《世要论》取儒法两家之长，提出“治国之本有二，刑也，德也，二者相须而行，相待而成”的思想。杜恕主张礼为万物之体，以儒家思想为主导著成《体论》这部具有完整体系的著作，但同时又在刑名学方面有深刻的见解（见《三国志·魏书·杜恕传》所录其上疏“世有乱人而无乱法”一段）。王符的《潜夫论》，崔寔的《政论》，仲长统的《昌言》，荀悦的《申鉴》及《周生子》，皆为这个阶段具有批判精神和理论深度的论著（周生烈，字文逸，自号六敝鄙夫，敦煌人。《三国志·魏书·王朗传》中言其“魏初征仕”，“历注经传，颇传于世”。《抱朴子·审举》言其“学不为禄，味道忘贫”，“学精而不仕”。《十六国春秋》载北凉永和五年向刘宋献书中有《周生子》十三卷。张澍、马国翰俱有辑本）。另外一些人则凭一己之谋略才干，试售于军阀门下，或献诗纳赋，草檄拟书，或随军参谋，亲临战

阵。王粲诗曰：“被羽在先登，甘心除国疾。”（《文选》卷27李注引）“楼船临洪波，寻戈刺群虏。”（《太平御览》卷351）皆其生活写照。徐干《七喻》曰：“战国之际，秦仪之徒，智略兼人，辩利轶轨，倜傥挟义，观彗相时。图爵位则佩六綬，谋货财则输海内。一怒而诸侯惧，安居而天下熄。”也正反映了当时士人的理想与追求。

汉末的文学创作领域，由于长期战乱，一方面残酷的现实使诗人作家不能不去关心切身之事，另一方面又差不多给士人的进取提供了同等的机遇。故“雅好慷慨”，多深沉激越的歌唱。曹操诗云：“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充满着事业未成、时不我待的悲慨，而藏在这悲慨后面的却是自信和积极上进的精神。建安至魏初很多作家的作品都渗透着这样的精神。如陈琳诗：“骋哉日月逝，年命将西倾。建功不及时，钟鼎何所铭？”（《游览》之二）阮瑀诗：“丁年难再遇，富贵不重来。良时忽一过，身体为土灰。”（《七哀》之一）曹丕诗：“嗟我白发，生一何早。长吟永叹，怀我圣考。”（《短歌行》）曹植早期诗中直接表现建功立业思想的作品更多。应该说，这是当时时代精神的反映。史载诸葛亮“好为《梁甫吟》”。学者们对《梁甫吟》是否为诸葛亮所作，看法至今不一。我以为《梁甫吟》不一定是诸葛亮所作，但他既好之，总反映了他的思想。相当一些人是不能理解诸葛亮何以喜欢这样一首反映着历史上一种阴谋事件（二桃杀三士）的作品。按魏刘邵《人物志·英雄》云：“聪明秀出谓之英，胆力过人谓之雄，此其大体之别名也。若校其分数，则互相须。”又云：“夫聪明者英之分也，不得雄之胆，则说不行；胆力者雄之分也，不得英之智，则事不立。是故英以其聪谋始，以其明见机，待雄之胆行之。雄以其力服众，以其勇排难，待英之智成之。”又云：“故雄能

得雄，不能得英。英能得英，不能得雄。故一人之身，兼有英雄，乃能役英与雄，故能成大业也。”以此而解诸葛亮“好为《梁甫吟》”之事，一切疑问可迎刃而解。诸葛亮“每自比于管仲、乐毅”，又“好为《梁甫吟》”，是赞许晏子之有智有胆，临事能断。他是仰慕那种能驾御众才的英雄人物。建安七子之一的王粲撰有《英雄记》一书（《黄氏逸书考》有辑本），历叙当时驰骋中原或扬名诸侯各类人的事迹。其中有一段说董卓欲任命一位司隶校尉，问于王允，王允荐盖勋。卓曰：“此明智有余，不可假以雄职。”则连董卓这样不学无术的暴虐军阀也知道英与雄之分。《三国志·魏书·武帝纪》载刘备败于吕布，投奔曹操，有人劝曹操：“观刘备有雄才而甚得众心，终不为人下，不如早图之。”曹操曰：“方今收英雄时也，杀一人而失天下心，不可。”可见其对人才的重视。“三顾茅庐”的故事发生在三国时代，并不是偶然的。徐干《中论·慎所从》云：“知则英雄归之。御万国、总英雄以临四海，其谁与争？”王粲《英雄记》正是各统治集团都重视网罗各类人才，而士人或出或处其理想皆是建功立业、立言救世这种风气下的产物。因为各诸侯都希望能发现人才、吸引人才、用好人才，故当时论述有关英雄人才理论的著作比较多。吴国姚信有《士纬》十卷，《姚氏新书》二卷。传为诸葛亮的《便宜十六策》见于著录较迟，但其中至少包含诸葛亮的部分人才思想（其中有的文字为唐代杜佑《通典》卷一百五十六和宋初李昉《太平御览》卷二百九十六、三百十三所引，作诸葛亮《兵法》）。郑樵《通志·校讎略》谓亡书有出于后世者，有出于民间者。《隋书·经籍志》言“梁有《诸葛亮兵法》五卷，亡”，则实未亡也）。尤其魏国刘邵的《人物志》，实为人才学方面集大成之作。该书对识人、用人和人才的素质、能力、类型及成功与失败间的关系，以及能力的发挥、争取成功的途径等问题都作了深入的探索。其中

《流业》篇将人才分为十二类，第十二类为“雄杰”。全书共十二篇，其中第八篇为《英雄》，专论各类人才中有胆有识的杰出者，不拘一格。尤其作者将帝王、君主看作“英”与“雄”素质兼具之最优者，纳入整个的人才序列中评说，反映了作者一种新的政治理想。作者一方面说“若一人之身，兼有英、雄，则能长世，高祖、项羽是也”，同时又说君主应是“聪明平淡，总达众材，而不以事自任者”。则作者是吸收了道家无为思想、法家“乘势”思想、儒家“尊贤使能”思想和对君主的圣哲理想希求等方面合理的因素，体现了作者对几千年政治史的深刻思考和总结，反映着作者的政治理想。

汉末魏初数十年确实英雄辈出，使很多人充分表现了才能，整个社会风气为之一变。士人出重功业，处讲著述，言贵救世，文尚通脱。无论在文学上、哲学上、政治上，都出现了明显的与前不同的色调。

还有一个重要因素促成了这个阶段文化思潮上的变化，这便是东汉后期佛教的传入。这不但在打破传统的儒家思想的主导地位方面增加了一股力量，而且佛教看待问题的方法，佛教经典的思辨性，也大大启发了文人学士。这对于魏晋时代文学理论、美学、人才学等方面一些具有较强理论概括性的著作的产生，起了催化的作用。

由魏晋开始，社会风气又为之一变。曹氏虽然篡汉，但确如曹操所说：“设使国家无有孤，不知当几人称帝，几人称王。”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曹氏的天下是曹氏自己打出来的。而晋之代魏，虽不能说司马氏于魏国没有功劳，但主要是靠阴谋的手段取得政权。晋初统治者为了保住自己的地位，采取了“诛夷名族，宠树同己”的手段，在知识分子心理上造成很大的压力。当汉魏之际各种思想都有机会被提出，都可以重作阐发之际，由于政治上的这种原因，当时文人们的思想便很自然

地偏向了老庄和佛教的方面，因为这二者都可以使人放开想不开的事，从心灵的折磨中得到解脱，都可以遁世。文人、贵族皆避开现实，谈一些玄远的道理，于是，老庄思想和佛教思想结合，产生了玄学。思想上的突破，往往发生在人们思想受到剧烈冲击之时；新的思想，也往往是在几种思想交融的情况下形成。正当各种思想都表现得空前活跃的时候突然出现了警戒线，一阵震动之后，便出现了脱离旧有轨道的新思潮、新风气。它不但不同于汉末魏初，也不同于此前的任何一个朝代。这既是一个“离经叛道”的时代，也是在思想领域产生大的突破的时代。

6 玄学有脱离现实的一面，但也有在更高层次上对社会、自然发展中的一些问题进行宏观深入思考的一面。这种思考是在汉末以来政治、名法、人才学等较充分发展的基础上进行的，因而它并不完全是不切实际的空谈，而含有对现实高度概括和抽象的因素。这样看来，汉末魏初这个阶段思想上的空前活跃所引起的后果并不是思想上的倒退，而是一种提升。那么，在玄学流行的这段时间的文学和文化现象，也是值得进行深入研究的。

志伟同志一直对魏晋文学与文化有浓厚的兴趣，且注意理论的研究，我觉得他是看到了这段时间中文化的特出之点及其在中国文学史、思想史上的意义的。近年中他承担了我主持的《唐前诗赋关系探微》项目中《魏晋诗赋关系》部分的撰稿工作，博士论文又是《“英雄”与魏晋文化研究》，去年又承担了全国高校古委会项目《陆机集校注》的任务，读了很多书。我一直提醒他多读原著，多读别集，多读有关这段时间前后的历史、哲学等著作，他也确实下了很大功夫。近来他根据新旧积累，写成《魏晋文化与文学论考》一书。书中有些内容（如上编的前两篇《中国古典“英雄”概念的生成》、《曹操是汉末三

国“英雄”典型》)因为在他的博士论文中也涉及,我曾同他多次讨论,也给他推荐过有关的书,其他内容,则由于最近忙于别的事,未能细看。但根据平时同志伟同志交谈,我觉得他在这方面的思考深入,有自己的心得。全书并未采取章节结构的办法,不是广采各家之说综合而成的高头讲章,而采用论文的形式,不求面面俱到。可以说,其中每一部分都闪耀着他思想的火花。

对于文学史的研究,50年代、60年代是要求必须同各个时代的政治、经济的状况相联系,80年代以来多强调从文学自身的发展规律进行研究,还有的是着重从审美或着重从揭示人性、人的心理特征、心理发展方面进行探讨。这些方法可以说都各有所长。关于魏晋文学的研究,鲁迅有《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联系当时的社会风气、文化现象来揭示这段时间中文学特质形成的原因,为我们从更广的视野来考察一个时代文学嬗变之机、文学特质风格形成之因由,留下了范本。这样做可能直接谈作品少,但可以使人看到潜藏在作品中的活着的人。志伟同志这本书,也是用这种方法进行研究的结果,所谓“虽未能至,而心向往之”。虽然几十年来研究魏晋文化与文学的论著不少,但就本书所涉及的范围来说,仍带有探索的性质,其中未妥之处,在所难免。但我相信会对魏晋文学与文化的研究产生积极的影响。

志伟同志要我作序,写出一些浅见,或有不当,读者正之。

2002年4月17日

《魏晋文化与文学论考》序

郑 文

志伟 1984 至 1987 年从我学习魏晋南北朝文学。期间，我督促他标点段注《说文解字》，习训诂、文字、音韵之学，读《资治通鉴》、《昭明文选》、《文心雕龙》及若干名家专集。志伟中学时受美学家高尔泰的较多指点，故我在《〈文心雕龙〉与黑格尔〈美学〉》课程外，又为他们这一级研究生加授了《系统论美学》课程。屈指算来，16 个寒暑已经过去了！

志伟 1995 年破格晋升副教授，1996 至 1997 年做北大访问学者，1998 年应邀赴台湾进行学术交流，1999 年考入赵逵夫先生门下，学习先秦至南北朝文学，加强对先秦原著的钻研，走以扎实考据功夫做严谨理论、思想研究之路。现在，他撰成《魏晋文化与文学论考》30 余万言，“论考”二字，正好标示其以论为本、注重考信的旨趣。其上编考论魏晋文化研究中五个尚未引起特别关注的方面，勾画出从“英雄”崇拜到追寻审美生活方式的演进特征；中编专论曹植、嵇康、阮籍、陆机等魏晋文化与文学的代表人物；下编着重论述与魏晋文化联系紧密的文学创作现象，体现了志伟的结构安排。

志伟的书，有五点值得称道：

一、有较开阔的学术视野。如“英雄”问题，志伟以 3 万余言，谈论中、西方“英雄”观，而其考源流、辨异同，思入微茫，可谓精到。如《曹操是汉末三国“英雄”典型》、《“胡

魏晋文化与文学论考 序

须”作为权力意志异化的象征符号》、《“崇友”意识与魏晋家庭观念的演变》、《“痴”与魏晋文化》、《子建“尘埃”与魏晋文化创造》等，都是着眼大的文化现象，论、考结合的扎实之作。

志伟重考证，尤重让考证发挥更大作用。《阮籍赋创作作时与赋体创作思维》，是篇好文章。阮籍赞张华《鹪鹩赋》，谁会发现其中藏有大奥秘？志伟能由阮籍与张华《鹪鹩赋》的深层关系契入，抓住阮籍全部六篇赋创作作时的内在联系，发现阮籍六赋与《大人先生传》的创作始末，正与司马氏从窃权到篡权的八年一致；再由《东平赋》作时考辨中发现阮籍后期“不与世事”、谨慎自保实为苦闷待“时”的真相，揭示阮籍寄托其宏大人生追求境界于赋，和以赋体创作作为其理性批判重要武器的深层原因。这就使传统考证这一手段为他论证阮籍“言有浅而可以托深，类有微而可以喻大”的赋体创作思维服务。志伟的追求，与或仅限单篇作品考证，或只重创作作时考辨，或单研究理论不同，其研究价值自然也就不同了。

二、关注学术发展与研究方法问题，能将传统训诂功夫，较为熟练地运用到理论研究中。我以为，理论与材料的关系问题，一直是20世纪学术研究没有解决好的难题。向有义理、考据、辞章之分。如欲三者兼善，必需全面性的知识储备。志伟追求义理、考据、辞章的结合，走文史哲融通之路，这是一条艰难之路。要真正融通，除了天赋和勤奋，还须正心养气，耐得住清贫与孤寂。尽管人心多欲，我以为，“板凳要坐十年冷”，志伟是做到了的。如《“胡须”作为权力意志异化的象征符号》一文，详辨曹操与崔琰之间包括“胡须”在内的复杂恩怨史实，并指出《世说新语·容止》所记是由司马彪《续后汉书·承宫传》所记承宫事迹巧妙嫁接改写的；以余嘉锡《笺疏》引程炎震等的说法与清汤球辑东晋邓粲《晋纪》等，详考《世

说新语·容止》第二十七条记桓温“鬓如反猬皮，眉如紫石棱，自是孙仲谋、司马宣王一流人”条的异文问题；引《说文》及段注，指出“脸旁靠近耳朵的头发，与络腮胡须即连鬓胡须并无截然的区别”，以明“鬓如反猬皮”，尤近于络腮胡须，再由《释名·释形体》、《玉篇》指出“髯”指两颊的胡须，而“紫髯”是孙权形貌的最显著标志，论述桓温眼紫而胡须络腮有如“反猬皮”，与孙权“紫髯”的相似；复由《晋书·帝纪·宣帝》记载司马懿有“狼顾相”，引《诗·豳风·狼跋》与应劭《风俗通义·正失》及高亨先生“胡”字又变为“鬍”说，辨明桓温与司马懿的相像；又详考桓温与刘琨、王敦相像的记载，结合魏晋政治文化现象，勾勒出以“胡须”作为权力意志异化象征的魏晋文化叙事模式。他如详辨曹操早年被桥玄等称为“英雄”；详辨刘备耳朵形貌特征与“圣人”的关系，揭示汉末魏晋时代“圣贤”思想退隐，而其在人们的思想意识深层仍具有巨大影响力；由“步”与“涉”提出解决从李善到赵幼文以来解释曹植《洛神赋》“陵波微步，罗袜生尘”难题的路径；考辨“五伦”与“朋友”的关系等，都显示了朴厚的学风。

三、注重文化整合与多学科结合。长期以来，人们每习惯于从某一学科或某一方面研究魏晋文化与文学，显得不够全面；而一些宏观之文，又多空疏之病。志伟探索结合之路，如对学术界所忽略的音乐与文学的关系问题，有较多的关注，书中的专论就有长篇大论三篇。

四、注重先秦原著与魏晋文化与文学的关系问题。这正是当今学术研究中较为薄弱之处。在国内学术界，志伟应能厕身于关注这一问题以取得实绩之列。

五、志伟属于有灵性类型的学者，他的选题多出人意表，创意浓厚。如他从文化语义学角度发现魏晋时代“痴”的审美与文化价值，从文化叙事模式角度论述“胡须”与权力意志的

关系，从“崇友”研究魏晋文化，从才气角度研究曹植以“尘埃”进行文学创造，从“崇友”研究嵇康的文学创作，复从创作时看阮籍赋体创作思维等，我认为都具有首创价值。但志伟并不刻意猎奇、炫奇，他注重研究的客观，以“求真”为研究的终极目的。

志伟今年 38 岁，今后的路很长。除本书外，近年将陆续研写《“英雄”与魏晋文化》、《魏晋艺术研究》等著作，本书仅为他“魏晋文化研究”系列中的第一本，其中自有不足。如文笔还可再精练些，有些材料还可再加甄别，若干思绪还有待完善。作为已过九旬的老人，祝愿志伟继续前进，以取得更大的成就！

2002 年 4 月 10 日

目 录

上 编

中国古典“英雄”概念的生成	(3)
一、“英雄”文化现代研究反思	(3)
二、“英雄”概念生成的语义溯源	(25)
三、“英雄”与人物品格褒词生成的广阔文化背景	(28)
四、“英雄”概念生成于汉末三国时代	(34)
五、王粲《英雄记》、刘邵《人物志》与“英雄” 概念	(42)
六、结语	(64)
曹操是汉末三国“英雄”典型	(67)
一、刘备与汉末三国“潜圣”人格形象	(69)
二、曹操是拨乱反正“英雄”人格形象的典型	(73)
三、曹操代表了“英雄”人格的复杂、变异特征	(95)
四、结语	(97)
附论：曹操与家族文化教育	(97)
“胡须”作为权力意志异化的象征符号	(103)
一、“胡须”象征“英雄”权力意志异化	(104)
二、“胡须”文化叙事模式成因探讨	(114)
“崇友”意识与魏晋家庭观念的演变	(124)
一、“朋友”与“五伦”	(124)

二、平等自由意识与魏晋“家庭”观念演变	(128)
三、魏晋崇“友”社会文化现象	(135)
四、结论	(139)
附论：阮籍的“崇友”方式	(140)
“痴”与魏晋文化	(145)
一、大器晚成：“痴”与“早慧”交相辉映	(145)
二、审美“移情”与追求审美化生活方式	(152)
三、“玄学”传统与“痴”的门风传承	(158)
四、“痴”是病态时代的病态之“花”	(161)
五、余论	(163)

中 编

2	子建“尘埃”与魏晋文化创造	(169)
	一、关于子建才气	(169)
	二、“尘埃”与子建的文学创造	(173)
	三、“尘埃”与魏晋文化创造	(180)
	四、几点启示	(184)
	嵇康兄弟之“谜”与兄弟关系	(186)
	一、嵇康兄弟当为三人	(186)
	二、嵇康兄弟关系考辨	(188)
	三、结论	(192)
	崇“友”意识与嵇康的文学创作	(194)
	一、早期生活与崇“友”意识	(194)
	二、崇“友”意识与嵇康诗文创作	(201)
	三、女性文学形象缺失与崇“友”意识	(211)
	阮籍人格之“谜”	(215)

一、从社会人格看	(215)
二、从自我人格看	(225)
三、结论	(228)
阮籍“癫狂”症说辨	(231)
一、青白眼不是青白“口”	(232)
二、病理视角：是佯狂，还是癫狂？	(233)
三、司马昭等不认为阮籍患有“癫狂”症	(239)
四、应严格区辨阮籍的佯狂与“至慎”	(242)
五、佯狂的内里：越名教而任自然	(243)
音乐意象与阮籍的文学创作	(245)
一、反思自然、社会之理	(245)
二、表现理想审美境界	(251)
三、结论	(259)
阮籍赋创作作时与赋体创作思维	(260)
一、创作作时与赋体创作思维	(261)
二、启示意义	(276)
《咏怀·其一》与阮籍“范式”	(278)
一、脱胎于汉末、建安诗歌的《咏怀·其一》	(279)
二、《咏怀·其一》审美意象的深层意蕴	(282)
三、结论	(293)
陆机诗学与赋学思想价值	(296)
一、诗、赋论与“十体”以及《文赋》整体	(297)
二、诗、赋论与诗学、赋学思想	(301)
三、结论	(312)
附论：陆机诗赋创作与其诗学赋学思想	(314)